

# 政治冷漠： 理论诠释、评估指标与破解手段 ——基于政治动机的维度

陈亮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 通常认为, 政治冷漠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缺少感受与兴趣的一种表现。此种认知无益于区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常态的政治冷漠与作为民主政治生活问题的政治冷漠。政治动机是评估政治冷漠是否作为民主政治生活问题的关键指标。“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 是当前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 是需要我们正视与解决的重要问题。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程序与过程, 一方面它能够充实公民的信息基础; 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 协商民主能够成为破解政治冷漠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政治冷漠; 协商民主; 政治动机; 信息基础; 参与能力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6-0108-07

随着政治冷漠成为民主政治生活的一种重要政治现象, 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开始研究政治冷漠与民主政治生活的关系。在有些学者看来, 民主政治生活的有效运转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 因为民主政治系统运转的效率通常与过高的公民政治参与成反比<sup>①</sup>。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本质, 较低的公民政治冷漠比例对民主政治生活的运转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因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体系存在的前提以及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基础<sup>②</sup>。从学术界对政治冷漠与民主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研究来看, 存在着简单地判断二者关系的线性思维倾向。这种倾向忽视了透过政治冷漠本身来区分何为常态的政治冷漠、何为非常态的政治冷漠, 无助于我们认知何种政治冷漠有悖于民主政治生活的基本精神。在现实的民主政治生活中, 常态的政治冷漠对于民主政治生活的运转是必要的, 只有非常态的政治冷漠才是民主政治生活需要正视的问题。政治动机是区分政治冷漠中何为常态、何为非常态的关键指标。基于此, 本文拟从政治动机的维度试图对政治冷漠进行理论梳理与现实形态评估, 继而提出政治冷漠的破解手段。

## 一、政治冷漠：理论梳理与概念诠释

### (一) 政治冷漠的概念辨析

关于政治冷漠的概念界定, 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从总体上看, 以下几种观点具有代表性。

一是从心理情感的维度界定政治冷漠。戴维·梅森(David S. Mason)、丹尼尔·纳尔逊(Daniel N. Nelson)、波丹·什克拉尔斯基(Bohdan M. Szklarski)等学者持此立场。他们认为, 政治冷漠是公民在公共事务中心理参与缺失, 情感脱离公民义务以及政治活动参与缺位的状态。<sup>[1]</sup>

二是从政治参与的维度界定政治冷漠。政治冷漠是指公民缺少兴趣、高度无知、极少参与。<sup>[2][119]</sup>杨光斌认为, 政治冷漠不过是政治参与中的一种现象, 它用来形容“无政治阶层”公民不参与政治的状态。<sup>[3]</sup>

三是从政治态度与行为的维度界定政治冷漠。王浦劬认为:“政治冷漠是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 即不参加政治生活, 公民对于政治问题和政

收稿日期: 2014-10-29; 修回日期: 2015-01-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研究”(12&ZD058); 2015年度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现代国家与国际秩序”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基金项目“欧盟气候治理体系三个维度的比较研究——基于‘制度—协商’的分析视角”(CCPDS-FudanNDKT15009); 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欧盟气候治理体系三个维度的比较研究——基于‘制度—协商’的分析视角”(2015062)

作者简介: 陈亮(1983-), 男, 河南信阳人,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民主理论, 治理理论

治活动冷淡而不关心。”<sup>[4]</sup>一方面，政治冷漠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它指的是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淡以及对政治问题的漠视；另一方面，政治冷漠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指的是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疏远和逃避。<sup>[5](420)</sup>概言之，政治冷漠是指普通公民无意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和态度的总称。

四是从心理情感与行为形态的维度来界定政治冷漠。政治冷漠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它指的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缺少感受、热情与兴趣；政治冷漠作为一种行为形态，它指的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和行动。<sup>[6]</sup>从作为一种特殊意识的政治冷漠与作为一种行为形态的政治冷漠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后者的原因，换言之，公民之所以在行为形态上表现为政治冷漠是因为当前他对公共事务缺少感受和兴趣。

总体来说，从心理情感与行为形态的维度来界定政治冷漠，能够更好地诠释政治冷漠的发生机制与本质内涵，但是也存在着不能全面准确反映现实中各种形态政治冷漠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即使公民对公共事务充满感受和兴趣，也可能在信息基础匮乏与参与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和行动。因此，本文认为，政治冷漠是指公民对公共事务缺少感受与兴趣或在信息基础匮乏与参与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和行动的行为形态。

## (二) 政治冷漠的性质判断

关于政治冷漠的性质判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冷漠是有益的。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们看来，政治冷漠对于民主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作用。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从一定意义上讲“民主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就某些个体和群体而言的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sup>[7]</sup>。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威廉·麦克菲(William McPhee)也表达了政治冷漠有益于民主政治的看法。<sup>[8](1)</sup>在他们看来，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既不可行也不可欲，政治冷漠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民主政治体系的运转。理由如下：其一，鼓励对政治不熟悉、无兴趣的公民参与政治，对民主政治体系没有好处；其二，坚持要求公民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容易带来盲目的政治参与；其三，即使在最理想的政治条件下，一些公民也不会具有进行复杂的政治判断所需要的实际政治知识；其四，广泛的政治参与还会造成公共议程的扭曲以及严重的政治分裂等。<sup>[5](421)</sup>总之，“较之消极冷漠、不参与的大多数，人少反而更好办事，更能解决问题”<sup>[2](129)</sup>，这种

来自经验主义的观察成为他们支持政治冷漠的基础。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冷漠是有害的。在参与民主理论家们看来，政治冷漠不利于民主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它侵蚀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影响了公共决策的合法性。诚如佩特曼指出的那样：“选举参与的下降不过是公民广泛不参与共同体生活的最为明显的症状，就像发烧感冒一样，公民选举的缺位虽然不是民主政治体系的本身弊病，但却是它陷入困境最重要的标志。”<sup>[9]</sup>戈尔(Gore)进一步指出，政治冷漠以及公民在选举和其他公共事务参与的下降与日益增长的公民犬儒主义倾向和对国家制度、流程完整性的不信任相联系。<sup>[10]</sup>因此，在他们看来，政治冷漠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影响了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为了改变政治冷漠的现状，佩特曼和巴伯分别开出了参与民主和强势民主的药方。20世纪80年代之后，协商民主理论家们结合政治冷漠的危害，又开出了协商民主的偏方。

从双方对政治冷漠的性质判断来看，他们更多地是从线性思维的角度去思考政治冷漠对于民主政治体系运转有益还是有害，忽视了从政治冷漠本身区分何为常态的政治冷漠、何为非常态的政治冷漠，只有基于一定的评估指标，对政治冷漠进行科学的区分，才能帮助我们判断政治冷漠的性质及其对民主政治体系的影响。

## (三) 政治冷漠的原因分析

政治冷漠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产生根源是错综复杂的，总体来说，政治冷漠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 1. 社区参与机会的减少

在托克维尔看来，社区参与是美国民主成功的关键，它影响了公民对待社区其他成员的态度，培养了公民之间的妥协意识和相互信任。沿着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经验总结，佩特曼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美国社区组织的减少，公民的参与呈现下降趋势，并且他还发现，社团协会中的成员参与政治活动与表达社会信任的可能性要比非社团协会中的成员大得多。因此，他认为，社区参与机会的减少是导致公民之间的信任降低，继而造成选举过程中投票率下降的原因。<sup>[11]</sup>武考克·迈克尔(Woolcock Michael)和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两位学者也指出，社区参与在美国的下降对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sup>[12]</sup>

### 2. 信息基础的匮乏

政治信息是形成公民偏好的前提和基础，公民只有在了解关于政治问题、政治制度、政治权利以及政

治过程的信息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选择政治参与。在很多情况下,公民由于缺少必要的政治信息而选择了政治冷漠行为,这一观点可以从格奥尔·卢茨(Georg Lutz)和迈克尔·马什(Michael Marsh)两位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印证。他们通过比较公民的信息基础与投票的关系发现,那些不投票的公民一般知晓的政治信息相对偏少。<sup>[13]</sup>玛丽莲·比勒(Marilyn H. Buehler)也认为政治信息的匮乏是导致公民政治冷漠的原因之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在信息基础匮乏的情况下,“某些公民缺乏必要的政治信息,他们无法有效地参与政治,并且不得不总是听命于信息占有者。”<sup>[14]</sup>

### 3. 政治参与的无兴趣

相关研究表明,一些公民之所以政治冷漠,并不是因为社区参与机会的减少和信息基础的匮乏,而仅仅是因为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约翰·希宾(John Hibbing)和伊丽莎白·塞斯莫尔斯(Elizabeth Theiss-Morse)通过调查显示,公民政治参与率低,不是因为公民缺少参与政治的路径或对某些政策的不满,即使在政治环境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喜欢政治。<sup>[15]</sup>经验表明,相对于家庭、友情、工作、休闲等日常事务来说,政治参与很难成为普通大众关注的首要事务,“普通公民对政治没有兴趣,公民参与少之又少,对许多事情公民没有什么看法,仅仅有出自情绪和感情变化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而已”<sup>[2](119)</sup>。

### 4. 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地位低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要低于经济社会地位相对高的阶级。<sup>[13]</sup>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弱势群体往往因为没有充足的资源、足够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选择了政治冷漠行为。汤姆·德鲁卡(Tom DeLuca)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说法。他认为,美国社会的“政治冷漠”现象跟经济、社会的不平等直接相关,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地位高的人投票率要高于经济社会地位低的人。<sup>[8](3-7)</sup>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结构性不平等的分析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政治冷漠的认识。“公共领域的结构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信息支配方面的不对称关系,也就是获得对信息之产生、确认、控制和陈述之机会的不平等。在这些系统性的限制之外,还有个人能力的不确定的不平等分布。”<sup>[16]</sup>正是由于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经济社会地位低的公民即使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政治,也会因为资源和能力的限制,在实际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这样,他们很容易选择政治冷漠行为。

上述关于政治冷漠的原因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这是因为,在公共决策的制定

和执行确实与一些公民的切身利益不相关或者有些公民确实对该公共决策的政治参与无兴趣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充足的政治动机去选择政治参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任何不基于公民政治动机本身去分析他们政治冷漠行为原因的研究,往往很容易不加区分地把常态的政治冷漠行为视为民主政治生活的问题,这样,既不利于触及政治冷漠的本质,也不利于当前民主政治生活困境的真正解决。所以,从政治动机的维度评估各种类型的政治冷漠行为,继而分析非常态政治冷漠行为形成的因素,就成为未来研究政治冷漠行为的重要着力点。

## 二、政治动机:政治冷漠的评估指标

政治冷漠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它是复杂的,同时也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认真对待政治冷漠,要求我们透过现象分析本质,对政治冷漠的类型与性质进行区分,集中精力关注那种与当前民主政治困境存在很大相关性的政治冷漠类型,它是我们需要正视与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根据公民是否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动机,将政治冷漠划分为“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与“无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其中“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它的存在不利于当前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

### (一)“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与“无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

通常我们会根据“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价值判断,想象出全体公民都会热心于、钟情于政治,事实上这种想象既不符合民主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也对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无益。从世界各国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情况来看,“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关心并了解政治,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在成年人中所占的比例不大”<sup>[17](131)</sup>,在罗伯特·达尔看来,确实存在一个“无政治阶层”的事实。对于“无政治阶层”来说,政治生活的地位远远低于家庭、友情、工作、休闲等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在他们看来,“政治介入所产生的感情、收入、安全、尊重、兴奋或其他价值大大逊于工作、看电视、读书、钓鱼、逗孩子、观看足球比赛或装置一个新的高传真音响设备”<sup>[17](133)</sup>。与其说,“无政治阶层”的公民看重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利益,轻视抽象、遥远的政治利益,毋宁说这是他们基于理性认知的一种选择行为。然而,当把政治冷漠定义为公民对公共事务缺少感受与兴趣时,我们对政治冷漠的理解就会陷入歧途。如

果政治冷漠仅仅就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缺少感受与兴趣，那么政治冷漠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就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现象，我们就没有探寻破解政治冷漠之道的必要；如果政治冷漠不仅仅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缺少感受与兴趣，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关注与解决对民主政治生活有至关重要影响的政治冷漠。

在现实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我们通常会发现，一些公民之所以采取政治冷漠的态度与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公共事务缺少感受与兴趣，恰恰相反，他们具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充满了兴趣，但却因为各种因素最终选择了政治冷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政治诉求并没有得到实质的表达与倾听，从长远来看，很容易产生对现存民主制度的不满与不信任，从而影响民主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转。为了更好地分析政治冷漠，本文从两个方面——是否受公共决策的影响、是否对政治参与有兴趣来评估公民的政治冷漠行为是否具有政治动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的公民具有很强的政治参与动机。一方面，是因为公共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他们确实对该公共决策的政治参与充满了兴趣。如果无视他们的政治动机，民主政治生活的实践就很容易把他们的态度与行为看成是一种正常的政治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公民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愿望，违背了人类设计民主政治生活的初衷。如图1所示，对于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等政治冷漠类型而言，一方面，它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它们诉求是于政治动机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它们是当前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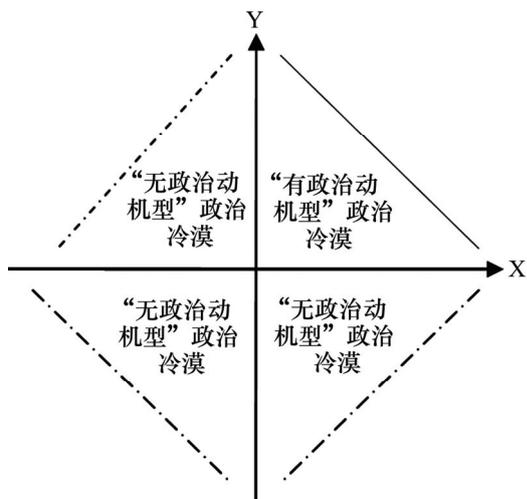


图1 “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与“无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示意图

(注：X轴表示是否受公共决策的影响，Y轴表示是否对政治参与有兴趣，其中X、Y的正方向表示肯定，反方向表示否定)

政治系统运转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不应该成为当前民主政治实践关注的焦点。

## (二) “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

### 1. 信息基础匮乏

随着“竞选政治”与“政治广告”的盛行，我们可能会习惯性地凭借经验得出：公民的信息基础是十分丰富的幻象。诚如乔万尼·萨托利指出的那样，就数量而言，问题大概不是信息太少而是太多了，现在的一般公民已被他们不可能消化而且令人厌恶的过剩信息淹没。<sup>[2](119)</sup>然而，这种主张公民信息基础丰富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有些学者看来，政治广告在基于理性判断方面几乎不发挥实质性作用，与之相反，它却传达了微妙的情感暗示，影响和改变人们对于政治候选人的情感认知。<sup>[18]</sup>从“竞选政治”的实际情况来看，萨托利在很大程度上误将政治广告煽动、说服选民参与投票的信息等同于公民做出理性决策所必需的信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沃金不无担忧地指出，美国的“竞选政治”将巨额财富置于政客及其顾问的掌控之下，这使耗资巨大的电视与广播竞选成为可能，这种竞选充斥着浮华、诽谤和对半真半假陈词的无休止重复，以及业已沦为智力退化型(dumped-down)政治之生命线的无意义的仿真叙述。<sup>[19]</sup>因此，在现实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竞选政治”“政治广告”使得各种政治信息广为传播；另一方面，公民做出理性决策的信息基础十分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些公民对公共事务充满感受与兴趣，也会因为信息基础的匮乏不得不放弃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基于此，我们认为，信息基础的匮乏是“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 2. 政治参与能力低下

赋予公民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共识，这是基于道德上与法律上“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从当前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实践来看，所谓公民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只不过是投票机会上的平等，它并不意味着公民在政治影响力上的平等。在很多情况下，虽然有些公民对公共事务充满感受与兴趣，但是因为自身参与能力的低下，导致无法有效地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更无法改变政治决策的结果，从而很容易成为政治冷漠者。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指出，那些政治冷漠者对于他们通过集体性的积极行动来影响政府运作几乎没有信心，并且他们对政治系统心怀不满，因为在他们

看来,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考虑。<sup>[20]</sup>基于此,詹姆斯·博曼深刻地指出,虽然政治平等不能消除公民在公共能力上的差异,但是它确立了一个所有公民进入政治生活的阙限:它预设的是公民之间最低限度的能力平等。<sup>[21]</sup>最低限度的能力平等,是确保公民拥有平等政治参与机会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公民之间才有可能发挥平等的政治影响力。事实上,在现实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弱势群体、少数民族以及种族群体由于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影响其他公民的态度与行为,所以最终选择了政治冷漠行为。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参与能力的低下是催生“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我们不难得出,“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的本质在于公民缺少自治或参与处理公共事务的机会,从而沦为定期投票选举政治家或代表的工具。传统自由主义民主视域下的竞争性选举,既不能为公民提供做出理性决策所必需的充足信息,也无法提供实质性的有效参与,提升公民的参与能力,因而不可能成为消解“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行为的手段。那么,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安排,才能成为破解公民政治冷漠行为的有益手段呢?只有为公民带来自治或参与处理公共事务机会的民主制度安排<sup>[22]</sup>,才能真正地克服公民“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行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安排,它通过为公民提供自治或参与处理公共事务的机会,一方面既充实了公民的信息基础,另一方面又培育了公民的参与能力,能够成为破解政治冷漠的一种有益手段。

### 三、协商民主:一种破解政治冷漠的有益手段

针对政治冷漠现象,特别是“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人群,当前民主政治面临的挑战,既不是思考如何增加参与政治的人数,也不是想象怎样扩大民主实践的范畴,而是通过提供一种程序,让那些本该参与政治的政治冷漠者能够发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协商民主作为这样一种程序,一方面,它通过提供公共决策的相关信息,能够充实公民的信息基础;另一方面,它通过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能够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协商民主能够纠正自由主义民主的不足,为破解政治冷漠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探索。

#### (一) 协商民主:作为破解政治冷漠手段的证成

##### 1. 协商民主能够充实公民的信息基础,为破解公民的政治冷漠奠定逻辑前提

协商民主作为一个程序与过程,它为公民自愿和自由地参与对公共主题的讨论提供了机会。一般来说,确定公共主题之后,正式启动协商民主之前,通常会事先向参与协商的公民提供与公共主题相关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解释和说明,确保公共主题的相关信息能够在公民之间公平地分配。正式启动协商民主之后,公民通过掌握的相关信息,陈述各自的偏好,并陈述相关理由,目的是达成基于相互理解与共同支持的公共政策。在协商过程中,公民的信息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充实,并且通过公共协商,公民能够基于公共理性审视自己,纠正对公共主题错误的理解与不合理的偏好,从而促进公民信息基础的理性化与科学化。总之,协商民主能够通过正式协商前的相关信息提供,帮助公民形成对公共主题的初步理解;同时,它还通过正式协商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与公共协商,最终帮助公民形成对公共主题的审慎理解。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协商民主能够破除公民的信息基础障碍,为“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者提供充实的信息基础,进一步为破解他们的政治冷漠行为奠定逻辑前提。

##### 2. 协商民主能够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为破解公民的政治冷漠创造必要条件

协商民主作为一个程序与过程,它为公民提供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的平台,“通过共享信息和集中使用知识,公共协商能够转变私人的观念并且提高他们掌握复杂问题的能力。”<sup>[23](272)</sup>在这个过程中,公民获取信息的能力、理解信息的能力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协商民主避免了“竞选政治”“政治广告”带来的各种与公共决策无关的、非理性的政治信息困扰。换言之,协商民主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它使得公民在政治信息大爆炸时代避免了无方向感,能够有效地把公民集中在一个与公共决策相关的、理性的信息环境中,通过共享信息与集中协商,促进公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理解信息的能力的提高。另外,通过公民偏好理由的陈述、辩论与推理,特别在涉及“道德分歧”等价值不可通约的公共主题时,公民运用信息进行推理的能力和基于互惠性的包容能力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是协商民主提高公民参与能力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总之,协商民主能够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消除“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者在政治参与能力上的障碍,从而能够为破解公民的政治冷漠行为创造必要条件。

## （二）协商民主：作为破解政治冷漠手段的路径

综合“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以及协商民主对补益该要素的契合性，笔者认为，协商民主能够成为破解政治冷漠的重要手段。通过信息的发布与共享、协商的启动与开展、培训的实施与反馈，协商民主具有破解政治冷漠的现实可行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信息的发布与共享

信息的发布与共享是形成公民信息基础的关键阶段，它对破解政治冷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古丁和西蒙的研究来看，相比协商讨论阶段而言，信息发布与共享阶段在形成公民偏好、改变公民态度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sup>[24]</sup>需要指出的是，此处信息发布与共享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竞选政治”“政治广告”带来的各种与公共决策无关的、非理性的政治信息，而是与公共决策相关的政治信息。通常来说，信息发布与共享的最好效果是，公民之间的信息基础大致均衡，这样就能够确保每一个公民在公共事务的协商过程中发挥平等的政治影响力。为了推动公民信息基础的均衡化，协商民主在实践过程中可以尝试以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政治信息，但需要强调的是，政治信息的传播不能激情煽动、片面、非理性，防止协商民主为政治冷漠开出的药方最后演化成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

### 2. 协商的启动与开展

协商的启动与开展能够进一步地完善公民的信息基础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因此，它同样对于破解政治冷漠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协商的启动与开展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为公民提供了讨论主题、交换意见、陈述理由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信息基础无疑会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同时，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如果说普通教育不可能替代公民政治教育、改善公众的政治参与水平，诚如文化水平很高而在政治上却是文盲的客观存在<sup>[2](121)</sup>，那么协商的启动与开展就是一场真正的公民政治教育。它通过政治实践的运作，一方面完善公民的信息基础，另一方面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者获得了表达意见与倾听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公民所受教育、性别、地位以及能力的不同，协商的启动与开展很容易被政治参与能力强的公民所操控，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建立协商主持人制度，“主持人通过规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不能超过发言时间，鼓励不善于表达的人尽量多发言，这样的方

式保证人们发言机会的平等。”<sup>[25]</sup>

### 3. 教育培训的实施与反馈

教育培训的实施与反馈以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为直接目标，当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提高之后，那些“有政治动机型”政治冷漠者自然不会再因为参与能力低下的问题而选择政治冷漠行为。相关经验与研究表明，公民在政治参与能力上存在事实上的差异，这是导致一些公民在政治协商过程中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为了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确保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分布大致均衡，协商民主需要开展公民教育来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以及获取信息的能力、理解信息的能力、运用信息进行推理的能力、基于互惠性的包容能力。诚如戴维·赫尔德指出的那样：“协商政治既要求提供充足的公民教育计划，又要求建立广泛的公共论坛以帮助‘提升公民责任和权力的质量’，即创建一种支持精致而深思熟虑之偏好的大众文化。”<sup>[23](287-288)</sup>此外，协商民主组织专家对参与公共协商的公民进行事前培训与事后反馈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对于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总之，从一定意义上讲，通过教育培训的实施与反馈，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能够得到有效提高和实现均衡分布，因此，我们可以说，协商民主能够成为破解政治冷漠困境的有效手段。

### 注释：

- ① 参阅：Bernard Berelson, Paul Lazarsfeld, William McPhee.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迈克尔·克罗齐等. 民主的危机. 马殿军等译.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9: 101; 罗伯特·达尔. 民主理论的前沿(扩充版). 顾昕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35-41.
- ② 参阅：Cavanagh T E. Changes in American voter turnout, 1964—1976.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81: 53-65; Salisbury R H. Research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5: 323-341; 本杰明·巴伯. 强势民主. 彭斌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 参考文献：

- [1] Mason D S, Nelson D N, Szklarski B M. Apathy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the Polish struggle [J].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991, 5(2): 205-233.
- [2] 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新论[M]. 冯克利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3] 杨光斌. 政治冷漠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5(3): 99-104.
- [4] 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20.
- [5] 潘小娟. 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6] Di Palma G. Apathy and participation: Mass politics in western societies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2.
- [7] 米歇尔·克罗齐等. 民主的危机[M]. 马殿军译. 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9: 101.
- [8] Tom De Luca. 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apathy [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9] 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35.
- [10] Gore A. The assault on reason [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8: 15.
- [11] Putnam, Robert 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6): 65-78.
- [12] Woolcock, Michael, Deepa Narayan.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0, 15(2): 225-249.
- [13] Lutz G, Marsh M. Introduction: Consequences of low turnout [J]. Electoral Studies, 2007, 26(3): 539-547.
- [14] 詹姆斯·博曼. 协商民主: 论理性与政治[M]. 陈家刚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253.
- [15] Hibbing J R, Theiss-Morse E. Stealth democracy: Americans' beliefs about how government should work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 [16]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童世骏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402.
- [17] 罗伯特·A·达尔. 现代政治分析[M]. 王沪宁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8] Valentino N A, Hutchings V L, Williams D.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advertising on knowledge, Internet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candidate preference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 54(2): 337-354.
- [19] 罗纳德·德沃金. 民主是可能的吗? 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M]. 鲁楠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16.
- [20] Bandura A. Exercise of human agency through collective efficacy [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0, 9(3): 78.
- [21] 詹姆斯·博曼. 公共协商: 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 黄相怀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108-109.
- [22] 马德普. 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吗[J]. 政治学研究, 2014(4): 18-26.
- [23] 戴维·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M]. 燕继荣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 [24] Goodin R E, Niemeyer S J. When does deliberation begin? Internal reflection versus public discussion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J]. Political Studies, 2003, 51(4): 627-649.
- [25] 何包钢. 协商民主: 理论、方法和实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18-119.

## Political apathy: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evaluation indicator and breakthrough means

CHEN Liang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political apathy is a manifestation that citizens lack feeling of and interest in public affairs. In fact, this percep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olitical apathy as a normal phenomenon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life and political apathy as an abnormal phenomenon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life. Political motivation is a key indicator to assess whether political apathy is a dilemma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life. The type of political apathy which goes along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is existent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which needs to be faced with and solv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s a procedure and process, can enrich the information basis and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ability of citizens. In a certain sens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solve the political apathy.

**Key Words:** political apat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motivation; information basis; participation ability

[编辑: 颜关明]